

附加价值论

邱永汉 著
王建成 译

海南出版社

中文版序言

日本人的经济成就为全世界所瞩目，然而，日本究竟如何从资源与资本均欠缺的国家变成经济大国，知晓其秘诀者却很少。

我除了在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就学时期以外，从1954年开始再度踏上日本的40年间，都是居住在东京从事文笔生涯，亲身目睹、体验日本从“想吃也吃不到东西”的状况，到脱离贫困深渊的历程，因此我深信：即使欠缺资源与资本的国家，也能够达到繁荣的境地。我更肯定地认为：正是因为日本人没有资源，而且欠缺资本，才会促成今天的成功。事实上，一个社会制度只要能够让优秀人才与工作意愿可以充分发挥，任何国家都能像日本一样成功。

中国台湾省与韩国眼看日本的成功，立即追随其后发展；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新加坡亦紧随台湾省与韩国前进。在这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当中，除了韩国以外，其社会成员都是以中国人为主，因此这些地区成功地工业化，为我们提供证言，那就是中国人拥有像日本那样可以获致成功的资质与天分。目前中国大陆在经济特区及开发区展开和日本以往一样的实验，同时也显现不亚于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实绩。1992年1月发表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后，更让人体会到中国大陆的开放政策已经进入全面开花的阶段。由于开放政策系采行优惠措施来引进外国资金与技术，因此，美国、欧洲资金也在优惠之列，不过其主要目标还是在借助香港地区、台湾省以及经济发展之日本的力量，来促进大陆经济成长。

我就“什么因素使得日本人成为世界首富？”以及“富有的日本人应该做些什么？”等问题，花了两年时间，分上下篇，将当前日本人的想法加以整理完成本书。我私下认为，本书或可作为有心超越日本经济成就之人的参考读物，尤其是对于想急起直追日本、想超越日本的中国人，或许有诸多值得参考之处。本书的中文版就是为这些中国人，首先在台湾省，接着在中国大陆出版问世。谨祈请诸位读者多提供高见惠赐指正，那怕是区区一两点意见，笔者将欣喜感激不尽。

前言

迄今约200年前，亚当·斯密有鉴于当时英属殖民地——美国在经济上快速成长，因而撰写了《国富论》一书。在斯密之前，财富或财宝被界定为是金银、宝石之类的珍贵物品，然而斯密却界定“劳动乃是财富的泉源”，他认为：“金银若能买到葡萄酒，那么制造葡萄酒的人就能以葡萄酒买到金银。”

斯密教授曾任教于爱丁堡大学，他的讲学极受欢迎，其《国富论》更被推崇为经济学开山之作。他具有说故事才能，因此，《国富论》内容不会像后世的经济著作一般枯燥无味。

其后大约经过100年，马克思从德国亡命到伦敦，见到当时的英国因为产业革命造成经济急速发展，但是增加的财富却据为资本家所有，住在贫民窟的劳工生活依然困苦，他有感于社会分配不均，乃撰写《资本论》一书。

马克思的主观意识，不易为人左右，也不接受他人意见，因此他不惜与反对其理论者敌对，而后世承继其思想者也完全承袭这种特质。他以“资本家的繁荣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的论述，诉诸社会正义感的众人，进而寻求改变世界，成为许多共产主义国家诞生的肇因。而如今，即使是未接受共产主义制度的先进国家，也莫不以社会福利作为施政目标。

就此意义而言，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其说是关于创造财富的思考，毋宁是代表劳工要求合理的分配；其著作与其视为经济学类，不如归之为社会思想史。

尔后再经过百年，生长于台湾省的我，在20世纪后半叶有机会到东京居住，亲身体战后的日本，如何由近乎废墟的境

况，在短短30年间发展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就我在大学所学的经济学而言，财富必须是拥有广大领土或资源丰富的国家才能创造出来，然而，如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NIES）等缺乏天然资源的国家，理论上应该被列为贫困国家，为什么他们能够创造今日的经济奇迹呢？

战后既无资本又无资源的日本，为了养活9000万人口，不得不自国外输入原料，经过加工制成产品再输出以赚取工资，日本国民全力投入这种创造附加价值的工作。虽然日本产品最初被评为“价格低廉、品质不良”，但曾几何时却成了世人最喜爱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也因而使日本一跃成为令人称羡的国家。

何以没有资本及资源的战败国能成为世界首富之国？究竟其成功秘诀何在？欲探究此缘由的当然不只我一人，不过我一方面不像一般日本人会陷于当局者迷的困境，另一方面也不会如美国的经济学者或社会学者，因不谙国情又不解其语言，经常有“瞎子摸象”的感觉。

基本上日本人今日所创造的财富，便是劳动力的产物，以此而论，我并不反对斯密及马克思的“财富为劳动所创”的见解，然而，日本人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将劳动力集中于创造“附加价值”，其结果就是工业化的成功，因此产生了“能因工业化获致成功就能成为富翁”的新法则。

我的前一本著作《富国日本论》（每日新闻社刊）系从日本人的生活、思想层面探讨其成功的原因，这次则主要着眼于经济面的分析。本书以80张稿纸分四次连载于《VOICE BUSINESS季刊》辑，值此单行本付梓之际，特别感谢该编辑部的安藤卓、出版部的松本道明等先生相助。

1988年12月吉日邱永汉笔于台北返东京华航班机上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章 日本人成为世界首富 的原因（1）

- 一、日本人重新证实劳动乃一切财富的泉源
- 二、日本除以加工业为生外别无选择
- 三、稍微过度的劳工运动使日本成为富有的国家
- 四、工业化使日本赚钱，也改变了社会形态
- 五、国内缺乏资源是发展工业的原动力
- 六、富裕美国中的穷人是日本人的救世主
- 七、一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是出口业的最佳磨练场所
- 八、无资源靠采购，无资本靠创造

第二章 繁荣的基础在于健全的借款结构 (37)

- 一、在健全借款结构上所建立起来的日本式经营
- 二、因贷款经营才不会发生折旧摊提不足
- 三、事业家策马前奔，银行家紧跟在后
- 四、赏花酒般的土地热潮巧妙地回避了破产
- 五、彻底模仿即可达到独创的境地
- 六、公司利益优先的团队合作
- 七、比按年资叙薪及终身雇用制更重要的因素
- 八、社会愈丰裕，借款与理财技术愈盛行

第三章 日本工业成功的秘诀 (71)

- 一、工业人口增加乃致富的保证
- 二、工业化使人口密度及贫富分配产生新的区域差距
- 三、对企业的归属意识造成技术累积
- 四、义父与义子、母公司与子公司皆为亲子关系的延伸
- 五、以金字塔型弹性结构来因应变化
- 六、所谓“畅销商品即好产品”的坚定信念
- 七、会赚钱是来自彻底实施品质管理及降低成本
- 八、从依赖产品输出转变为生产技术输出

第四章 日本流通业为世界带来 流通革命（105）

- 一、稻米自由化所暴露出来的日本经济结构
- 二、重视生产者而“漠视消费者”的经济政策
- 三、类似草食动物肠子般的漫长流通管道
- 四、商社是在日本产生的“国际批发商”
- 五、日本所发明的“零售店杰作”是百货公司
- 六、从超级市场所看到的流通革命与反革命
- 七、非关税壁垒的要害在于消费者对价格欠敏感
- 八、日本大型商店正在东南亚进行流通革命

第五章 服务先进国——日本的全球 战略（139）

- 一、日本茶道体现出服务业的地位与水准
- 二、以“站在消费者立场”来制造产品的服务先进国
- 三、酒家女侍是日本式服务的象征
- 四、用心捡回花在外国的金钱
- 五、美元疲弱使日本金融机构有出头的机会
- 六、资金都先集中到东京再往外流出
- 七、日本人变成富翁就迫使日本人离开日本
- 八、在海外生存的诀窍是下一个重要课题

第六章 资金将突破国家的界限（176）

- 一、金本位或纸币本位的货币伎俩都是一样
- 二、即使滥发纸币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的理由
- 三、贸易持续失衡资金就会开始大移动
- 四、阶级斗争虽已结束，但国别等级却变多了
- 五、国民情绪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 六、企业挑选哪一国为投资对象，哪一国就变得丰饶
- 七、聚财机会将扩大，“回力镖现象”亦将趋于常识化
- 八、美元时代结束，确立以地区为单位的自给自足体制

第七章 全世界的劳力资源正 等待日本去开发（213）

- 一、追求附加价值乃开发劳力资源的原动力
- 二、人手不足产生了克服人手不足之道
- 三、生产自动化使日本摆脱石油危机后的困境
- 四、从高劳动生产力的国家移转到低劳动生产力的国家
- 五、有钱的日本人所应扮演的角色
- 六、日本人不在意政府忽视消费者权益的政策
- 七、价格理论已不适用于日本
- 八、资本向劳动资源未开发的国家移动，劳动力则朝反方向移动

第八章

富有国家政府的应有 作为（252）

- 一、对国家想法改变必然导致国家本身的改变
- 二、日本累进税制值得重新评估
- 三、生产优先于分配已得到证实
- 四、日本政府机关很难摆脱“教育妈妈”的角色
- 五、成熟社会的政府机关主要工作为保护消费者利益
- 六、政府征税必须考虑不让纳税人感到痛苦
- 七、不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一等国家才是先进国家
- 八、“援助哲学”是教导而非施舍

第一章

日本人成为世界 首富的原因

一、日本人重新证实劳动乃一切财富的泉源

马克思和斯密指出劳动为财富之泉源

迄今约200年前，亚当·斯密有见于当时的英属殖民地——美国在经济上快速成长，因而撰写《国富论》一书，该书开宗明义即阐述：“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是提供每年消费必需品与生活所需服务之泉源，这些必需品及服务是劳动的产物，也可出售换取他国财货。”亦即，“人类创造所有财富，更以劳动来创造必要的财富。”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即以上述认知作为开端。

今日我们或许会认为这只是一般常识，然而在18世纪，人们却以为只有金银珠宝才是财富，不认同“劳动即财富”，因为只要拥有金银币、珠宝等财货，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获得所需的物品。犹如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每到陌生国度便问：“此处有无金山？银矿的生产量是多少？”若得知该地无金也无银矿，便随即离去。

在18世纪就指出“劳动力是所有价值的泉源”、“金银若能买葡萄酒，则葡萄酒也能买到金银”的就是斯密。斯密之后大约再经过100年，卡尔·马克思见到生活在贫民窟的人们，整天辛劳工作却无法摆脱穷困，反观其雇主资本家则过着富庶的生活，两相对照成了强烈对比，因此撰写《资本论》一书。由于马克思对低阶层受压榨民众的义愤及同情，因此无法客观地探究整个经

济结构。他以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来说明经济社会的构成，同时为了强调其理论的科学性，更以其执拗的特质大力阐述，例如应用“剩余价值”及“资本累积”等独特说法来揭发资本家的罪恶，更将斯密的劳动价值说狭义化，主张财富并非劳动所得，而是取决于劳动时间。

综观斯密因观察美国的经济的发展，以及和各国的贸易往来所产生的“理论”，和马克思观察伦敦贫民窟劳动者所形成的“理想”，两者之间并无共通点，勉强可以说的只是他们皆认为“劳动才是财富的真正泉源”。

到了20世纪后半叶，我因机缘定居东京，亲身经历了日本从战败国废墟，转变成为经济强国的历程，给了我相当大的启示。战前的日本可以说是资源匮乏国家的代表者，当时日本人深信一国的贫富兴衰，取决于该国天然矿产资源的有无，因而以具有丰富资源的地区作为目标，展开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由于其侵略性太强，结果引发了世界大战，最后导致日本丧失所有的殖民地，使得9000万人口被孤立原有的四个小岛上，陷入有始以来的最大危机。

如果资源的有无决定一国的财富，那么日本人的发展就到此为止。但是，日本人却从这个危机中振作，再次出击，不仅恢复国力，而且成为世界的经济超级强国。由此观之，使日本人变成首富的原因就不再是资源了，而且他们自废墟里茁壮起来，几乎是没有任何资本，何况又缺乏土地，其境内光山地就占了全国领土的85%，平地比例之小更不用说了。

如果说财富的泉源既非取决于天然资源，也非决定于土地的多寡，那么便是操之于劳动了。早在斯密时代即已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时至20世纪末，也仍是通用的概念原则。

所谓劳动的意义，并非像马克思以抽象性的劳动时间来衡

量那般单纯，劳动有许多种类，有劳心、劳力的劳动；有高技术性和低技术性的劳动。例如，有从事户外的劳动，有辛勤如清道夫、煤矿工的劳动，也有服务台、管理室般轻松的劳动；有汽车驾驶、飞行员等运输方面的工作，也有全神贯注于几亿美元外汇买卖的工作。

凡此种种劳动，因其性质不一，不能单纯以时间来评估其价值，况且劳动时间对于各种劳动代价的支付并无严谨的规范，只有相称的、大约的薪酬价码。而且在支付薪资、原料等成本后，再从销售价格上扣除提供服务费用的余额，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剩余价值，我们则称之为附加价值，这是在完成一种商品，或一项服务所附加产生的价值。附加价值的大小无法事先由自己决定，而且在这些产品未换成金钱以前也不会有明确的数据，但是这种或大或小的价值，却可以累积成为社会的财富，而且每年比他国更快速与庞大地累积这种附加价值，则此国家必定成为富有国家。

以附加价值的形式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其分配的比例也会因时代及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在马克思的时代，伦敦劳动者的微薄所得仅够糊口，而大部分的附加价值却归资本家所有，就因为此种现象才使得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家压榨劳动者的结果。

日本战后多数附加价值分给劳动者

由于马克思及其信仰者在近一个世纪所发动的劳工抗争运动影响战败后的日本，促成了多半附加价值以薪资或奖金等方式分配劳动者，剩余部分则定为利润。然而其中的50%—60%又需缴纳政府税金，课税后的余额则多半作为公积金或保留盈

余留在公司，因此惯例上只有少数残余的利润作为红利分配给股东。这种制度的建立乃因战败后的日本已经没有西方式概念的资本家，变成一个“劳动者之国”。

当然，任何国家的劳工运动兴起，必然要与资本家对峙，然而日本原来的财阀已经解体，社会上最高的支配阶级又遭盟军放逐，使得日本国内几乎没有所谓的富豪存在。

此现象正如太宰治所著的《斜阳》一书所描述，昔日的有产阶级，包括皇亲贵族在内都已变卖家产，有土地的卖土地，有古董、艺术珍品的也一一拿出来卖，这些人都无法重振声威，再担当财经界的领导阶层（除少数有才能的企业家以外），因此劳工运动失去斗争对象，便转而以那些独占金融资本或公司的董事长为假想敌对面，作为提高工资的斗争对象。

诚然，若因员工罢工而在公司或银行门前设置拒马，难免会妨害营业，因此为了尽量不使劳资争议扩大，只要公司有余裕资金就接受员工的加薪要求。而且代表公司的主管，以前也都是属于工会的劳工之一，和其他员工一样从公司收入中支取薪资，现在只是因为受命经营，站在公司的立场而已。

虽然创办者就是董事长这种原则并没有太大改变，可是企业的规模愈大，其持股就愈少，因此董事长只是代表公司的员工。相同情形若发生在美国，董事长持股未过半数则非交出职位不可，然而在日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却是分开的，其中又以经营者的发言权较大，因此虽然仅持3%的股份，也能保有董事长的职位。虽然持有较大股份的董事长面对公司员工时，不免会有倾向股东权益的立场，但是也有相对地站在代表公司和员工这方面而和股东交涉的情形。

此种组织形态，使得董事长与员工不会常常处于对立的地位；如果有利害冲突，也只是为了公司长期的稳定性，在营业利

润中该给公司留下多少准备金的意见差异而已。因此比起马克思的时代，日本企业有更多附加价值分配给劳动者，而即使不分配的部分，也大半留在公司不分配给股东，股东对此做法也无异议，因为70%的股东是法人，其余个人股东则因为股权太零散没有发言权，只能默默领取所分得的红利（就如同存款者对存款利息不表示反对意见一般）。

此种分配方式是否理想，或因人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论调，但对于没有资本、资源的国家，在面临可能饿死的危机下拼命生产，并使得财富逐渐增加，最后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这无疑是劳动的结果。但是劳动的内涵和斯密或马克思时代已有显著不同，这也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人的财富是经由何种渠道建立起来的？又如何改变世界经济？别的国家能否加以模仿？世界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今后又会如何？种种问题，容于下章分别叙述。

二、日本除以加工业为生外别无选择

被臆测再经过100年也无法复兴的战后日本状况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我正在冈山县上道郡浮田村的水田里除草，由于当年3月9日东京遭遇大空袭，仓惶间就疏散到在乡下的东大同学家。我有几位要好的同学，如广岛造酒屋之子及冈山电机技师之

子，都邀请我到他们家避难。由于广岛的同学家位于大街上，我心想若再次空袭又得逃避疏散，倒不如住进冈山郊外无人居住的茅屋，因而选择了冈山县同学的住处。而如果当时选择在广岛，可能早已被原子弹炸死了。

迁居冈山县乡下之后，我也随着学习割麦、耕田、插秧及烧炭等方法。虽然居处乡间，但因为同学的亲人担任天皇侍从长要职，因此不论战况动向、天皇不满陆军领导阶层的决策等皆能获知。所以我虽然身在田园除草，心里却认定战争即将因日本投降而结束。

当广岛被投下原子弹，传来惨酷伤亡的消息时，就盛传广岛已经变成了废墟，即使100年后连青草都长不出来。

8月15日早晨收音机里传出天皇即将在正午广播。由于其时正盛行“玉碎论”，因此多数人认为这是天皇为激励国民所作的演说，而当我告之“战争将要结束了”，却几乎无人相信，直到天皇亲自宣布投降，大家才惊疑地说“那个人莫非是间谍，否则怎能预知战争要结束了呢？”

这真是奇闻，我当然不是间谍，只是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再根据此信息判断推测罢了。

战后我决定返回东京。当时东京自上野到本乡一带都是灾区，幸好东大校园并没被烧毁，而我的行李就寄放在经济系研究室内。领了行李后我搬往大东亚学生宿舍，这是战时为外国留学生所建的公寓。

放眼望去，四野尽是荒地废墟，日本人则处于虚脱状态，许多外国人看到这片荒芜景象都认为：“即使再过50年，日本也没有复兴的希望，甚至百年后亦然。”当时我也作如是观。

台湾省及韩国过去都是殖民地，两地人民皆受到被支配民族的差别待遇，但是随着战争结束，台湾人及韩国人一夜之间成